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靳德行 主编

秦英君 李占才 副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主 编 靳德行

副主编 秦英君
李占才



河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按照中国通史的编纂方法，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1949—1988年中国近四十年来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它不同于一般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而是一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著。全书线索清晰，内容丰富，立论亦较准确稳妥，是高等院校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的适用教材，也是党政干部、中学教师学习的参考用书。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史

主 编 靳德行

副 主 编 秦英君 李占才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0.125 字数：505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2次印刷

书号：10001—17000册 定价：7.20元

ISBN 7-81018-275-7/K·31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编写中的几个问题

(代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为了满足高等学校教学和党政干部、中学历史教师学习参考需要而编写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尤其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之后，在教学和科研的实践中，在有关部门和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逐渐趋向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本书的编写从1986年开始，曾先后在开封、苏州、青岛召开了三次编写会议，对全书的观点、体系、章节布局、内容取舍、资料筛选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磋商，又经过编者们三年的努力，几易其稿，终于成了现在的样子，并以诚挚的心情将她奉献给读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整个中国历史的研究中，至今还是非常薄弱的一段，全面正确反映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思想等内容，确非易事。在编写中，我们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体系、内容、史料、观点等问题，作了以下的安排和处理。

一、关于“国史”的体系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是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史的继续和发展。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不仅仅是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而应全面反映包括台湾在内的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

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成立到今天，已经近40年。它将继续发展下去。我们这本书是写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到1988年的历史，它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开篇。

我们在“国史”的编写中，按照中国通史的体系分章布局，每章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主党派、文化教育以及台湾问题等内容分类设节，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线，并从社会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的总体中，按年代顺序阐明历史发展的进程，力求全面反映这一阶段的历史面貌，并努力探讨其发展规律。全书的基本线索如下：

第一阶段，即1949年10月至1952年12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百废待兴，但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新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恢复了国民经济，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第二阶段，即1953年1月至1956年12月，这是实行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和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阶段。这一时期，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到1956年底，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第三阶段，即1957年1月至1966年4月，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在这十年中，党和国家工作的主导方面是正确的。1958年到1960年，由于建设社会主义指导方针上犯了“左”倾错误，导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失误，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对国民经济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有了恢复、发展。但是，“左”的指导思

想并未得到彻底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有所发展。从整体上说，十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第四阶段，即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十年中，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始终占支配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项工作和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但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斗争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全国在粮食生产、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仍然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取得了很大进展，并且在若干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第五阶段，从1976年10月开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时期。1976年10月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实现了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努力进行各项建设，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实事求是地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取得了可喜成果，也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党和国家不断纠正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国家机制和各项建设向健康方向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近40年的发展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们在“国史”的编写中，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依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尊重历史实际，力求准确的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客观地总结经验教训，为今天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二、关于“国史”中的经济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40年来，经济建设的成就是伟大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是中国进行恢复国民经济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年10月到1952年底，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及长期的战争破坏所造成的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使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在全国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1953年元月到1956年底，全国又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为中国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二阶段，从1957年元月到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联及其它友好国家的支援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成了包括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电讯、化学、军工等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同时，工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商业贸易兴旺，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是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急于求成，片面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1958年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经济上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造成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跌，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党和国家领导人虽然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并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和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若干“左”倾错误进行了纠正，全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是，1959年8月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右倾斗争，中断了对“左”倾错误的纠正，又把许多“左”倾错误观点和做法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从而使“左”的错误进一步延续和发展，大跃进运动继续高

涨，造成了严重危害，再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债款，使得国民经济从1959年底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严峻的现实教育了中国人民，党和政府总结了经验教训，致力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制订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面调整国民经济，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第三阶段，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即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中国国民经济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时期。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改变了国家以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全国动乱，国民经济的生产机制瘫痪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极力破坏经济建设，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企业严重亏损，市场产品匮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下降，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第四阶段，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现在，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时期。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国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但是，由于建设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没有得到清除，致使国民经济出现了徘徊局面。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引导全党、全国人民积极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实现了重大的战略转折。全国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国民经济出现迅速、持续发展的好势头。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又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中国的经济体制突破长期形成的僵化和封闭的模式，逐渐形成有活力、有生机和开放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新体制，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改革是一场革命，是前人未曾做过的事情，改

革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挫折，但党和国家坚持实事求是，注意调查研究，不断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关于“国史”中的外交问题

建国近40年来，中国的外交大致经历了五个不同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50年代中叶。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先后在中国周围挑起了朝鲜战争、印支战争和制造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企图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全力支持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因此，这时的中国外交实行了“一边倒”的政策，重点发展和加强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同时，逐步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一些亚洲邻邦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粉碎了美国政府企图扼杀新中国的阴谋，保证了国内各项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在这6年多时间内，中国先后同欧洲16个国家、亚洲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第二阶段，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中苏两党间产生分歧到60年代中叶。这期间，由于苏联党以“老子党”自居，苏联政府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政策，企图控制中国，致使中苏两党关系恶化。这时，美国政府也在中国周围组织军事包围，并支持蒋介石集团窜犯大陆，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处于严峻局面。党和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一面同苏联党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并“勒紧腰带还债”；一面对美蒋反动派严阵以待，坚决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从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度过了外交上的严峻时期，赢得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重点开始转向积极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同6个亚洲国家、18个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的古巴、欧洲的法国等国家建交。这一阶段中国的

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中共对苏共等兄弟党内的事务作了不适当的指责，片面强调“反修防修”斗争。

第三阶段，从60年代中叶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到7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美国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并逐步升级侵略战争，一直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南大门，苏联自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陈兵百万于中苏、中蒙边境，并在珍宝岛与中国兵戎相见，成为中国北方安全的严重威胁。一时，世界上掀起一股反华、排华浪潮。中国政府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对来自苏联的威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阶段，中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失误，主要是推行“反修防修”、“输出革命”、“要把中国变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等等“左”倾的外交方针政策。第四阶段，从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阶段，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以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为契机，实行了灵活的外交政策，基辛格秘密访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地位的恢复、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等等，使中国的外交出现了新的转机。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得到许多国家的拥护和支持。这期间，中国政府先后同59个国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第五阶段，从1979年1月到现在，这近十年中，由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肃清了“左”的错误，把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方面。同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进一步调整了对外政策，尤其是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把外交重点放在了同世界各国，尤其是同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方面，扩大和加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国、日本、欧洲共同体及其它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同时，随着苏联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逐步缓和并改善了同苏联以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截止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同135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178个国家和地

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

为了充分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近40年来对外交往的历程，本书在编写中，每章都专设了“国防建设和外交关系”一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上的不同时期分别进行了叙述，其中对各个时期外交上的重大事件、政策变化、成功与失误等都作了分析和评价，以求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近40年外交工作的全貌。

四、关于“国史”中的教育问题

建国以来的教育事业几起几落，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12月，是中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阶段。这期间，虽然面临着建国初期存在着的重重困难，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仍以极大努力恢复和发展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基本建立起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教育体系。同时，这一时期中国的教育是以苏联教育为模式的，所以在学习苏联的经验中，存在着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缺点。第二阶段，从1957年1月到1960年10月，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为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试行了全日制与半工(农)半读相结合的教育制度，用公办和民办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法发展教育事业，对学生进行了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等方面的教育，批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世俗偏见，开始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风，对不适合中国实际的教学制度、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改革，开始探索和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教育体系。但是由于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发展，教育事业也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和影响，如把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到不适当的高度，忽视了对文化

科学知识的学习，以及不顾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盲目发展教育事业，导致文化课的教学质量下降。第三阶段，从1960年11月到1966年4月，这期间，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同时，检查和纠正了教育战线上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克服了教育事业发展过快、战线过长、占用劳动力过多等问题。通过砍、并、缩等措施，对教育事业进行了全面调整；随着整个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中国的教育事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基本上建立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体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发展，教育的正常秩序受到冲击。总的来说，“文革”前的17年中国的教育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也是主要的。第四阶段，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国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这期间，在“教育要革命”的口号下，“文革”前的17年教育被诬为“黑线专政”，广大知识分子被打成“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被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唯一方针。尽管从1970年开始对教育事业进行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但十年教育事业的荒废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造成中国教育事业的危机。第五阶段，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至今。这期间，党和政府对教育事业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否定了“四人帮”对“文革”前17年教育的“两个估计”，把发展教育事业提到了同发展工业、农业、能源和交通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下，1985年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四有”人才，恢复和发展中国教育事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恢复招生制度，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等，中国的教育事业开始走向正轨。但仍存在着重视不够的失误。

建国近40年来，教育事业的发展成绩是巨大的，但教训也是

深刻的。在“国史”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就我国的教育方针、教学体制、教学制度、内容和方法，给以客观的介绍和评价，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为今后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五、关于“国史”中的民主党派问题

在建国后的近40年中，各民主党派经历了发展、停顿、遭受严重破坏、重新恢复发展四个历史时期，经受了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大的冲击和挫折。

第一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7年6月反右派运动，是民主党派的发展时期。全国解放前夕，各民主党派汇集解放区，同中国共产党和其它各界人士共商开国大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出了贡献。建国初期，各民主党派为适应新形势，加强了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各民主党派都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统一思想，整顿组织，重新审查登记成员，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明确划定了各自发展的范围。“民革”的对象主要是原国民党党员及与国民党有一定历史联系的人士；“民盟”是文教界和知识分子；“民建”是工商业资本家及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民进”是中小学教师和文化出版界人士；农工民主党是公职医务人员和医务工作者；九三学社是科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台盟”是中国大陆上的台湾省籍同胞。各民主党派都吸收了新成员，组织得以发展。在这一时期，各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投身于各项社会改革，并注意自身的改造。它们在反对国内外敌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推进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发展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也是正确的，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多次召开统战会议，帮助各民主党派发展组织，帮助民主党派度过了“土地改

革”、“社会主义改造”两大关。1956年4月，毛泽东又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国内的政治形势有利于民主党派的发展。第二阶段，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是民主党派遭受冲击和停止活动时期。1957年6月开始的反右派运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反右斗争”扩大化，把民主党派的大批成员错划为“右派分子”。随后，各民主党派开展的内部整风运动，实际上是“人人过关”的政治批判。被错划为右派的民主党派成员，一部分人被开除公职，实行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伤害了民主人士的感情。三年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开始注意纠正“反右”中“左”的错误，调动党外人士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对右派进行甄别平反，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民主党派成员予以摘帽。民主党派又一次经受了考验，并在调整国民经济中献计献策，为克服经济困难作出了贡献。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影响下，统战工作中“左”的错误不断发展，民主党派的活动几乎中断。第三阶段，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民主党派遭受严重破坏的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左”的错误，全面否定建国后17年来统一战线的工作，否定民主党派为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贡献，疯狂迫害民主人士。民主党派的各级组织被诬蔑为“牛鬼蛇神的黑窝子”，机构被砸烂，房屋被占用，文书档案和办公设备被洗劫，大批民主党派成员被诬为“特务”、“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政治上受迫害，经济上被剥夺，精神上受折磨，肉体上受摧残，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面专政”的“左”倾狂潮冲击下，民主党派蒙受了一场空前浩劫。第四阶段，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民主党派进入全面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认真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以前“左”的错误，拨乱反正，为

一大批民主党派成员平反昭雪。中共中央进一步指明民主党派已根本改变了过去以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党性质，已经发展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中共十二大进一步总结了多党派合作的经验，提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民主党派首先恢复了组织活动，健全了各级组织机构，开始走向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民主党派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投身建设事业，以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为总目标，团结台湾、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和一切爱国力量，为积极推行“一国两制”的方针，致力海峡两岸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建国近40年来，民主党派实现了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经历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获得了不断进步。民主党派的活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国史”的编写中，依据历史本身演进的轨迹，力求系统地反映民主党派建国后近40年来的发展道路。在本书第一章、第三章、第五章辟专节写民主党派，分别叙述不同时期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同时，对处于执政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及其失误和偏差，也秉笔直书，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六、关于“国史”中的军事问题

建国近40年来，中国在军事上虽然也走过一些弯路，但成绩是主要的，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现代化、正规化为目标，先后组建了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战略导弹部队等领导机关，形成了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统一了全军的编制体制，建立健全了全军的领导机构，划分

了战区，逐步完善了战略战役指挥体系，实行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解放军的军事建设和技术装备现代化建设开始起步，为以后各项军事建设和国防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完成了解放祖国大陆和肃清匪特的任务，保卫了新中国的安全，还派出志愿军入朝作战，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由于中国的安全受到美蒋反动派的严重威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国防建设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国家设立国防委员会，代替原来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全国军事系统的中央领导机构。全国原有之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军区，改划为沈阳、北京、内蒙古、济南、兰州、新疆、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西藏、福州13个军区，从而形成了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分区防御国防体系。同时，这一时期，全军在继承发扬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使军队在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方面向前迈出了一步。在这一时期，为加强国防力量，分三批从朝鲜撤回中国人民志愿军19个师，对于美蒋反动派的空袭、炮击、派遣特务活动，给以坚决打击，并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1955年5月，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苏军从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撤走。至此，除台湾、香港、澳门外，中国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国防。第三阶段，即1957年1月至1966年4月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这10年期间，中国在军事和国防建设上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并积极参与了社会主义建设，平定了西藏叛乱，粉碎了台湾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阴谋，取得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尤其是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因“左”倾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中，也存在着一些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和缺点。尤其是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

批判彭德怀和罢免彭德怀国防部长的职务，以及在军队中揪所谓“彭党”人物，对军队建设产生了不良影响。在军队政治思想工作中也存在着“左”的错误，如林彪提出的一套庸俗化、教条化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方法。1964年5、6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对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和紧迫性作了过分的估计，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准备打仗”，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大力建设战略后方，影响了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打乱了国防建设的正规化和常规化。第四阶段，即“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这10年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军队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尽管在当时曾起了一定稳定局势的作用，但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后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曾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致使一大批解放军干部被批判、被清洗。1975年，邓小平虽然开始着手对军队进行整顿，但由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已经开始的军队整顿工作中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虽然处于动乱之中，但人民解放军仍然保卫着祖国的安全，英勇地捍卫着祖国的边疆海防，多次打退了外部敌人的入侵，维护了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第五阶段，即从1976年10月开始的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时期。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贯彻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方针，军政素质有明显提高，军队的整编和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部队的军事训练、思想政治工作、院校建设、后勤保障、军事学术研究和防务作战能力有所加强，干部的指挥能力和专业水平有新的提高，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抢险救灾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1981年9月，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和空军部队，在华北地区举行了规模较大的现代化条件下的军事演习，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素质和作战能力。1980年5月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1981